

当前广州社会的代际流动*

郭 凡

本文根据90年代广州的一次抽样调查中有关人们对自我和父母社会地位(经济地位、声望地位、权力地位和整体地位)的主观评价的资料,分析了当前广州社会的代际流动问题。本文通过对不同社会地位的代际流动方向、流动率以及影响流动的若干因素的比较研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广州社会的开放度。

作者:郭凡,男,1959年生,广州市社会科学联合会秘书长。

社会流动是指个人及其家庭在某一社会的阶层体系中从一个位置走到另一个位置的过程,也即地位取得(status-attainment)的过程。这一个过程可以从两个角度考察。一是代际流动,即父母与子女两代人之间社会地位的改变,包括上向或下向的流动;二是代内流动,即个人在不同时期的地位变化,也包括地位的升降。社会流动研究的主要目的,一是从较宏观的层面去比较不同经济、不同政治环境及发展阶段的社会,看其社会开放度、流动模式及其机会分配等方面的异同;二是从较微观的个人层面去讨论教育、出生或其他因素对个人在攀升社会地位的过程中所起的正负影响。^①

广州一直处于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相对较早,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也相对发达。在这一条件下,广州社会的开放度到底有多大?人们所能获得的升迁机会究竟有多少?影响人们地位变动的主要因素是什么?解答这些问题有助于通过一些政策措施协调不同阶层或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以及促进社会的开放、平等和进步。本文将从代际流动的方面探讨一下广州市90年代以来的社会流动的问题。

一、以往研究回顾

广州以及珠江三角洲地区代际流动问题的研究,主要有郑德本1987年对广州城郊农村的个案分析^②和李若健1988年在广东顺德北窖镇以及中山市郊区所做的调查^③

前一项研究主要通过考察1978—1984年间广州市郊鹭江村村民父子两代所从事职业的变化来研究其代际社会流动率,通过与35年前岭南大学社会学系在鹭江村所做调查进行历史比较^④分析社会流动的趋势。该项研究表明,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父子两代的职业结构发

* 本文资料的数据处理由童晓颖、黄善玉完成,文字打印由田向东完成,谨此鸣谢。

① 李明望、黄绍伦主编:《社会学新论》,香港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

② 郑德本:《城郊人口的社会流动研究》,《珠江三角洲集镇与居民》第11章,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③ 李若健:《珠江三角洲城镇化过程中的职业垂直流动研究》,《珠江三角洲集镇与居民》第6章,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④ 张淑芳、黄定国:《鹭江村四代阶级及职业流变》,《岭南大学毕业论文》,未发表,存中山大学图书馆。

生了巨大变化,父代从农比例占 80%;与 35 年前相比,这种变迁愈加明显:35 年前农业中子从父业者占 49.9%,80 年代前期只有 39%。从总体上看,35 年前鹭江村的代际社会流动率为 40%,80 年代前期则上升到 56%。

后一项研究的重点是通过研究小城镇和城郊居民个人职业以及代际职业的垂直流动,从一个角度展示珠江三角洲地区 1979—1988 年间的城镇化进程。与前一项研究直接将职业人数进行比较的客观方法不同,本项研究是首先将职业划分为农民、普通劳动者(包括工人、商业人员)和技术劳动者(包括干部、教师、科技人员)三类等级不同的职业;然后由被访者对三类职业进行主观评价;最后分析出两代人之间在职业上的流动。经过研究,发现代际职业垂直流动分布:上向 42.96%,下向 14.44%,不变 42.60%,流动率为 57.40%。

以上研究对于我们了解和认识改革开放以来广州以及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社会流动与社会变迁问题是很有价值的。但是,作为更深入和全面认识 90 年代以来广州及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社会流动问题,上述研究还有一定的局限性:首先,从地域上看,上述两项研究主要反映的是城郊和小城镇居民的社会流动现象,缺乏对大都市社会流动的调查研究,尤其是作为珠江三角洲地区中心城市的广州城区居民,应当是不可缺少的调查对象;其次,单从职业角度(尤其是简单地将职业归为三大类)难以准确评价其流动的方向,例如从富裕的广州郊区农民向城市一般工人的流动,便很难肯定它是一种上向流动。最后,从时间上看,随着 90 年代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社会变迁的速度也在加快,因而对新时期社会流动问题也应当有再研究、再探讨的必要。

二、调查与研究方法

本文分析的基础是广州市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和香港理工大学(原香港理工学院)应用社会科学系于 1992 年上半年在广州市合作进行的一次抽样调查的资料。^①调查对象为年龄在 18 至 65 周岁的广州市城区居民,总体规模为 232 万人口。抽样方法采取 PPS 原理设计的多阶段抽样(Multistage Sampling),在确定各区抽样规模后,分别对街道、居委和居民进行随机抽样,最后抽取了 1230 个调查对象,样本经过与 1990 年人口普查资料比较,两者在性别和年龄段的总体分布基本相符,表明所抽取的样本具有代表性。调查是由经过培训的访问员根据我们提供的被访者名单逐一入户进行的,最后完成访问并收回问卷 874 份,回收率为 71.06%,实际回收的有效问卷是 850 份,有效率是回收率的 97.25%。^②

调查问卷的设计是以个人自我评价的主观指标为主的。涉及本文“代际流动”这一主题的指标,是被访者对自己经济地位、声望地位、权力地位以及整体社会地位的评价,和被访者自己对其父母在职期间在上述几种地位方面的评价。评价分为上、中上、中、中下、下共 5 个等级,因此,原则上说,每位被访者都会将自己及其父母的各种地位主观地确定在某一位置上。本文主要通过这种个人的主观排位来看代际流动现象,并通过与一些相关因素的交互分析来看代际流动的特点。

因此,本文研究代际流动不是从具体职业的角度,而是从一种较为综合和抽象的角度(经济、声望、权力以及整体社会地位)进行分析。当然,职业因素依然是人们作出上述评价的一个基本出发点。这种方法既避免了研究者自己先入为主地将各种职业划分等级的主观臆断,同时

① 本次调查的课题组成员:广州市社会科学院有李江涛、蔡国萱、郑德本和郭凡;香港理工大学有李明望、李健正、余云楚、陈锦华、何国良和罗水生。

② 有关本次调查方法的介绍参考了蔡国萱女士的文稿。

也照顾到了社会地位的多元化现象,尤其是经济地位与声望和权力地位相分离的现实情况。

三、资料分析

(一)自我及其父母社会地位的主观评价

问卷中设计了这样两类问题:(1)如果我们将广州人的经济地位(或声望地位、权力地位、整体地位)差别划分为五层——上层、中上层、中层、中下层、下层,就你目前的情况而言,你会将自己摆放在哪一层?(2)你觉得你父母(在职期间)的经济地位(或声望地位、权力地位、整体地位)是在哪一层?要求被访者就上述两类问题中不同的地位分别作出选择。调查结果(表1)表明,关于自我经济、声望和整体地位三项评价,70%左右集中在中等和中下等两个层次上。但是,关于自我权力地位的评价,则集中在下等和中下等两个层次上,占67%。关于父母地位的评价,与自我评价趋势大体一致,主要差异在于:对父母地位的评价更趋于两极化。例如,认为父母社会地位(权力地位除外)处于下层者,高出自我同一地位评价的7—14%。认为父母社会地位(经济地位除外)处于中上和上等者,也高出自我同一地位评价的2—3%。

表1 自我及其父母社会地位的主观评价 (%)

评价项目	下	中下	中	中上	上	不知道	(个案数)
经济地位 自我	21.1	33.2	39.4	3.9	0.8	1.6	(750)
	35.6	22.2	32.2	4.3	0.9	4.8	(725)
声望地位 自我	20.0	23.4	43.4	7.5	1.7	4.1	(718)
	27.2	18.4	36.4	8.0	3.2	6.7	(699)
权力地位 自我	41.7	25.2	24.1	2.8	1.4	4.9	(703)
	42.1	20.6	23.5	4.6	2.2	7.0	(687)
整体地位 自我	19.3	29.5	42.0	3.1	1.2	4.9	(711)
	29.3	21.7	34.8	5.3	2.1	6.8	(697)

(二)代际流动

关于代际流动的分析是基于上述自我地位和父母地位评价两项资料所进行的交互分析,目的是想表明:有多少人对自己地位和父母地位的评价是一致的(地位不变)?有多少人对自己地位的评价高于对父母地位的评价(上向流动)?有多少人对自己地位的评价低于对父母地位的评价(下向流动)?流动率则是上向流动率和下向流动率之和。下面将分别分析不同社会地位的代际流动情况。

经济地位的代际流动 表2显示,在自我经济地位的不同层次上,代际流动的方向是完全不同的,自我经济地位处于下层者,有30%强的人地位低于父辈,呈下向流动;处于中下层者,上、下向流动各占30%左右;处于中层和中上层者,上向流动率明显增强,各占43%和73%强;处于上层者基本上表现为上向流动。显然,自我经济地位的高低与代际流动方向直接相关,即:自我地位越高,上向流动比例越大;相反,自我地位越低,下向流动比例则越大。

表 2 经济地位代际流动交互表 (%)

自我 \ 父辈		经济地位代际流动交互表 (%)						(个案数) (750)
		下	中下	中	中上	上	不知道	
下		<u>65.8</u>	11.2	17.4	1.2	0.6	3.7	(161)
中下		32.0	<u>34.0</u>	26.1	2.8	0.8	4.4	(253)
中		23.7	19.7	<u>46.0</u>	5.0	1.3	4.3	(300)
中上		23.3	16.7	33.3	<u>23.3</u>	—	3.3	(30)
上		50.0	16.7	16.7	16.7	—	—	(6)

注：下划横杠的数字表示两代之间地位一致，其下方数字表示上向流动，其上方数字表示下向流动。其他表同此。

声望地位的代际流动 声望、权力及整体地位的代际流动，总的方向与经济地位代际流动是一致的。但是，从比例上看则有各自的特点。根据表 3 中的百分比分析，声望地位处于下层和中下层者，下向流动率更强，分别达 36% 和 37%；处于中层和中上层者，上向流动率又明显低于经济地位的同类比例，分别为 32% 和 64%。由此说明，要获得高于甚至等于父辈的声望地位，相对于经济地位而言，机会更少，难度更大。

表 3 声望地位代际流动交互表 (%)

自我 \ 父辈		声望地位代际流动交互表 (%)						(个案数) (718)
		下	中下	中	中上	上	不知道	
下		<u>58.0</u>	14.7	18.0	2.7	0.7	6.0	(150)
中下		30.3	<u>28.6</u>	29.7	4.6	2.3	4.6	(175)
中		17.0	15.4	<u>48.8</u>	11.4	3.7	3.7	(324)
中上		10.7	14.3	39.3	<u>16.1</u>	10.7	8.9	(56)
上		15.4	7.7	61.5	7.7	<u>7.7</u>	—	(13)

权力地位的代际流动 在权力地位的代际流动方面，根据表 4 所示，首先是维持地位不变的比例较大，尤其在自我权力地位较高的层次上，父子之间的传承因素比较明显。其次，处于权力地位中上层者，上向流动的比例也较大，占了 76%。

表 4 权力地位代际流动交互表 (%)

自我 \ 父辈		权力地位代际流动交互表 (%)						(个案数) (703)
		下	中下	中	中上	上	不知道	
下		<u>59.4</u>	13.3	15.9	3.2	1.6	6.5	(308)
中下		31.2	<u>37.6</u>	20.4	4.3	1.1	5.4	(186)
中		27.5	18.5	<u>42.1</u>	6.2	2.8	2.8	(178)
中上		33.3	9.5	33.3	<u>23.8</u>	—	—	(21)
上		30.0	10.0	20.0	—	<u>40.0</u>	—	(10)

整体地位的代际流动 整体地位的代际流动的各项百分比(见表 5)，与声望地位的代际流动情况基本一致。这主要是因为，人们在对整体社会地位作出主观评价时，更多的是参照了

社会声望的标准。

表 5 整体地位代际流动交互表 (%)

自我 \ 父辈	父辈						(个案数) (711)
	下	中下	中	中上	上	不知道	
下	59.7	16.7	14.6	0.7	1.4	6.9	(144)
中下	28.1	37.1	24.0	4.5	0.9	4.1	(221)
中	17.8	15.3	53.5	7.3	1.9	4.1	(314)
中上	17.4	13.0	30.4	17.4	21.5	-	(23)
上	11.1	-	6.7	11.1	11.1	-	(9)

以上是分层次反映的各种社会地位的代际流动情况。为了直观起见,可将不同社会地位的代际流动分别归纳为上向流动、地位不变和下向流动三种情况(详见表 6,排除了问卷回答“不知道”的个案)。这样,我们便可得出如下结论:当前广州人的代际流动率大致在 50—55% 之间,其中经济与声望的代际流动率较大,但是两者相比,子辈在经济地位方面超过父辈的机会更多;权力与整体地位的代际流动率相对较小,但是两者相比,子辈在整体地位方面超过父辈的机会更多,而权力地位的代际流动则相对凝固、上下流动率基本保持平衡。

表 6 四种社会地位代际流动的总况 (%)

社会地位 \ 流动方向	经济地位	声望地位	权力地位	整体地位
	(n=719)	(n=684)	(n=668)	(n=676)
上向流动	33.2	30.1	24.3	27.8
地位不变	46.9	44.6	50.4	50.4
下向流动	19.9	25.3	25.3	21.8
流动率	53.1	55.4	49.6	49.6

(三)代际流动的若干影响因素分析

在了解广州社会的代际流动性之后,有必要进一步揭示促成这种流动的一些内在因素,或是形成流动性之大小和流动方向之不同的一些内在因素。本文选择了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单位性质、行业以及工作变动频率几项因素,分别将其与表 6 所列几种社会地位的代际流动的百分比进行交互分析,结果如下:

性别因素 对经济地位和权力地位的代际流动具有一定的影响。在经济地位的代际流动中,上向流动男高于女 3%,下向流动男低于女 2%。在权力地位的代际流动中,上向流动男高于女 4%,下向流动男低于女 2%。因此,可以说,男性相对女性而言,在上述两方面的代际流动中有获得地位升迁的更大机会。但在声望和整体地位方面,性别对于代际流动的影响不明显。

年龄因素 由于人们的社会地位往往是随年龄增长而升迁的,青壮年人超过其父辈的可能性往往小于中老年人。因此,年龄因素对于代际流动的影响是自不待言的。但是,通过分组比较,仍可看出在不同地位的代际流动中年龄差异的一些特点。本文将被访者分为青年组(18—30 岁)、壮年组(31—44 岁)、中年组(45—54 岁)和老年组(55—65 岁)四个年龄组,经与

各种地位进行交互分析,其结果如表7。总体而言,各种社会地位的代际流动,上向流动随年龄增长而增大,下向流动随年龄增长而减小;但是,在经济地位方面,老年组的上向流动率明显低于中年组,其上向流动率低于中年组7%以上,而下向流动率则高于中年组8%以上;青壮年组与中老年组在代际流动方面也存在明显的差异:其中,在经济与声望地位的代际流动率方面,中老年组比青壮年组高10%以上;整体地位的代际流动率,中老年组也高出6%以上;但是,权力地位的代际流动率,中老年组则低于青壮年组近6%,主要是因为青壮年组权力地位下向流动率过高(占36.3%),而老年组的下向流动率又很低(占9.9%)所致。

表7 年龄因素与代际流动的关系 (%)

年龄分组	经济地位		声望地位		权力地位		整体地位	
	上向	下向	上向	下向	上向	下向	上向	下向
青年组	25.9	25.9	20.5	30.2	16.5	36.3	22.8	25.1
壮年组	31.8	19.0	29.8	24.4	25.9	23.5	26.1	21.7
中年组	49.4	10.1	41.4	23.0	32.1	16.0	37.5	15.0
老年组	42.1	18.4	46.6	16.4	32.4	9.9	38.4	17.8

教育因素 受教育程度历来被看成是影响代际流动的重要因素。但是,根据我们的调查分析,受教育程度与代际流动的方向并非一种简单地呈正比或反比的关系(见表8)。上向流动率较大者分布于受教育程度的两端,即小学及以下者和大学及以上者两部分;小学及以下者的下向流动率亦属最低;当然,总的说来,代际流动率则与受教育程度呈正比,即小学及以下程度者流动率为38—48%之间,中学程度者为48—55%,大专程度者为52—59%,大学及以上程度者为65—70%(应当指出的是,其中小学及以下者的经济地位代际流动率高达56.30%,大学及以上者的整体地位代际流动率低至52.4%,均在上述范围之外)。

表8 教育因素与代际流动的关系 (%)

教育程度	经济地位		声望地位		权力地位		整体地位	
	上向	下向	上向	下向	上向	下向	上向	下向
小学及以下	42.0	14.3	31.5	16.6	24.0	14.5	32.7	6.6
中学	33.4	18.4	29.9	25.0	21.6	26.8	26.7	22.0
大专	27.0	25.8	26.5	30.1	30.7	28.4	27.9	24.4
大学及以上	44.7	25.5	42.9	26.2	41.5	24.4	38.1	14.3

单位经济性质因素 处于不同经济性质的单位中的人们,其代际流动也是不一致的。如表9所示,经济地位方面,三资企业和私营/个体经济的从业者的代际上向流动远高出全民和集体经济单位的职工,并且三资企业职工经济地位的代际流动率最高,达62.5%,集体经济则最低,仅有47.8%;但是,在其他几种地位方面,三资企业职工的代际流动率则相对较弱,在36.4%—47.8%之间。私营/个体经济的代际流动,除权力地位仅为36.6%外,其余几种地位

的流动率均比较高,在 53.5%—63.4%之间。

表 9 单位经济性质因素与代际流动的关系 (%)

单 位 经济性质	经济地位		声望地位		权力地位		整体地位	
	上向	下向	上向	下向	上向	下向	上向	下向
全民经济	33.7	20.2	32.3	24.3	26.4	23.8	29.4	21.2
集体经济	31.6	16.2	30.5	28.2	22.3	26.9	23.4	21.8
三资企业	41.7	20.8	17.4	21.7	17.4	30.4	18.2	18.2
私营/个体经济	42.2	11.1	31.7	24.4	17.1	19.5	36.6	26.8

行业因素 行业不同也是影响资源分配的因素之一,本文综合比较了几类主要行业(见表 10),显然,行政机关人员的代际上向流动除在经济地位方面不突出外,其它三种地位的上向流动均远远高于其它行业;相反,对于工交建筑以及服务行业而言,除了在经济地位方面上向流动的机会较大之外,在其它三个方面的上向流动和下向流动各占 25%左右,因而作为群体而言,地位升迁的机会不大。

表 10 行业因素与代际流动的关系 (%)

行 业	经济地位		声望地位		权力地位		整体地位	
	上向	下向	上向	下向	上向	下向	上向	下向
行政 机关	34.3	27.4	47.9	21.1	40.9	15.5	39.7	16.2
科教文卫行业	34.9	19.8	34.6	24.7	19.3	25.3	30.1	19.3
工交建筑行业	32.1	19.2	28.4	26.9	23.1	23.9	24.6	23.1
服 务 行 业	39.8	18.4	25.0	25.0	23.2	24.2	26.0	26.0
金融邮电行业	25.0	11.1	28.6	25.7	23.5	41.2	22.2	13.9

工作变动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工作单位的变动甚至职业变动的机会明显加大,使人们的社会流动成为可能。通过对工作变动的频率与代际流动的交互分析发现(见表 11),与工作未变动者相比,工作变动者的代际流动率更高,并且表现为上向或下向流动均有较大的可能性。

表 11 工作变动因素与代际流动的关系 (%)

工 作 变动次数/年	经济地位		声望地位		权力地位		整体地位	
	上向	下向	上向	下向	上向	下向	上向	下向
未变动工作	33.3	16.9	29.8	23.4	23.5	24.6	26.3	20.7
变动一次	34.2	26.7	32.4	24.6	25.4	23.9	26.4	19.3
变动二次	35.2	19.3	29.1	30.4	23.1	25.6	33.3	24.4
变动三次以上	30.5	21.0	28.3	29.3	26.8	28.9	31.9	26.3

四、结 语

通过以上资料分析,大致可以得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初步认识:

首先,90年代的广州市民从其主观认识的角度来评价自身及其父母的几种社会地位所反映出的代际流动率大致在50—55%之间。这与前文介绍的郑德本和李若健两位从职业流动的客观角度所考察的广州及珠江三角洲部分地区80年代中后期56—57.4%的代际流动率相比还是比较接近的,尤其是我们调查中有关声望地位的代际流动率(55.4%)与其更接近。另外,将广州的代际流动情况与1973年美国的一项代际流动调查的结果相比较,这项调查以代际间的职业流动为测度标准,其结果是:上向流动约46%,下向流动23%,代际流动率69%。^①显然,如果代际流动率反映社会开放度的话,80年代和90年代初的广州社会则尚未达到美国70年代初的开放程度。再则,客观的职业变化所反映的代际流动与人们主观感受的地位变化虽然基本一致,但也存在一点差距,虽然代际间职业有所变动,但有时人们在感觉上地位并无大变化。可以说,主观上对社会地位流动的感受偏低一些。

其次,根据我们的调查,广州市民在代际流动中所能获得的升迁机会(亦即上向流动率)因社会地位的不同而有所差异。经济地位在代际流动中获得升迁的机会最大,其次是声望地位,再次是整体地位。权力地位的升迁机会最少,因而显得最为封闭。子辈比父辈获得更多升迁的机会,是社会进步发展的一种趋势,如先进工业的发展,教育的普及和教育程度的提高,社会提供更多的从体力劳动到脑力劳动流动的机会等等,便是社会进步所带来的“结构性流动”。从广州的情况来说,这种结构性上向流动更主要地表现在经济地位方面。

其三,性别、年龄、教育、单位性质、行业以及工作变动频率等因素均在某种程度上或某些方面对代际流动构成影响。大体上说,经济地位方面,在三资企业或私营企业从业的,受过较高文化教育的中年男性超过其父辈的可能性最大;声望和整体地位方面,在行政机关和科教文卫行业工作并受过高等教育的中老年人超过其父辈的可能性最大;权力地位方面,在行政机关工作并受过高等教育的中老年人超过其父辈的可能性最大。

最后,本文的分析表明,代际流动因人们的社会地位的不同方面而有所差异。例如,一个人可能在经济地位方面超越其父辈,但可能在权力地位方面反而不如其父辈。从多元化的角度看人们社会的代际流动,可以了解一个社会在哪些方面更加开放,在哪些方面又相对封闭,显然,当前广州社会经济方面的开放度大于政治方面。

责任编辑:张宛丽

^① 根据戴维·波普诺著,刘云德等译:《社会学》(下册)第37页表11·2整理,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